

1605

修武文史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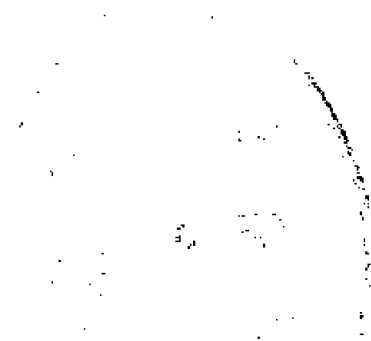
第七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修武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月

修武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修武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月

前 言

修武县在台湾的同胞达数百人，各界名人很多：有艰苦创业、蜚声海内外的企业家，有培桃育李、为人师表的教育家，有辛勤笔耕、著述颇丰的学者，有情系故里、造福桑梓的海外赤子……他们虽然远离故乡四十余年，但和修武县人民同系炎黄子孙，骨肉相连，热爱、思念故乡之情，魂缠梦绕，不可抑止。近几年来，海峡两岸关系逐渐趋向和缓，前来故乡探亲寻根者，络绎不绝，为沟通海峡两岸关系，促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作出了贡献。

实现祖国的早日和平统一，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双方在一些问题认识上的歧见，但是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双方的努力，终有一天会达到“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也是我们编纂本辑文史资料的衷心愿望。

修武籍海外同胞史料丰富，由于种种原因搜集困难，编入本辑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热忱欢迎各界人士惠赐资料，俟后陆续编印。

目 录

任克重和中华艺术陶瓷·····	任惠珍 (1)
拳拳赤子桑梓情·····	张福麻 (13)
——张鸿春教授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事迹	
赵明普先生和豫剧·····	朱建华 (18)
我所知道的范争波先生的几件事·····	郭景道 (21)
张侯生先生行述·····	张鸿胪供稿 (29)
张侯生处决匪霸毒犯阎夺斌·····	赵凤祥 (34)
关于赵学颜先生的乡闻·····	常效顺 (37)
翟韶武两任县长期间的轶事·····	翟国杰 (40)
对张侯生、翟韶武两先生业绩的补充·····	李东方 (43)
盼亲人望眼欲穿 作诗句寄托相思·····	薛焕猷 (46)
三纲与五伦 (节录) ·····	翟韶武遗著 (52)
修武旧时礼俗·····	张卜麻 (55)
补白篆刻·····	韦 强
政协焦作市委员会委员牛永贵创设文史资料奖·····	(68)

任克重和中华艺术陶瓷

任 惠 珍

我哥哥任克重，1911年10月10日出生于修武县大位村。自幼好学不倦，抗日战争时期，曾先后就读于重庆立信会计学校、复旦大学及中央干部学校。勤奋攻读，夜以继日，从不浪费时间。他常说古人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敢不自勉。这不仅使他学习成绩优异，且养成了坚韧不拔的性格和日后在事业上取得斐然成就的重要因素。

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银行界和工商界工作。到台湾后，曾任教于台北商业专科学校；并著有《会计学》问世。

哥哥自幼濡染中国传统文化，深知民族文化乃民族命脉，亦国家存亡所系。环顾台湾陶瓷业凋零，遂奉献毕生心血于艺术陶瓷之研究。先于1958年2月10日创立中华艺术陶瓷公司，专门仿制中国历代名瓷，积近三十年之努力，产品造型达千余种，均属高水准的艺术装饰陶瓷器，行销世界各地。1972年5月20日，又创立台湾境内第一座私人博物馆—中华博物馆。馆内收藏历代文物精品数千件，长期陈列展览。1977年6月10日又创立中华艺术馆及中

艺陶瓷公司。中华艺术馆是一座综合性的艺术中心，生产与陈列中国古代各种文物的仿制品数千种，集中华文物之大成。其规模之宏伟，在台湾除故宫博物院外，皆无可比拟。中艺陶瓷公司是为配合中华艺术馆的业务发展而成立的，以仿制故宫博物院之明朝青花细瓷及清朝彩瓷为生产目标。以外，还创办有中华农林公司，中华陶瓷研习班，中艺合唱团。为便于对上述七个事业单位的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特于1977年11月12日成立中华艺术关系机构管理总部，简称为“中华艺术关系机构”。共有从业员工八百余人，我哥哥担任董事长。

艰苦创业 坚韧不拔

哥哥为实现弘扬中华文化的宏愿，于1958年2月在台北县中和乡的秀朗村买了一块七百坪的土地，成立了中华艺术陶瓷公司，当时员工不满二十人，厂房是用竹子搭成的棚盖。尚未投入生产，忽然台北县拆除大队说这块地是都市计划住宅区，不能设工厂，并不容分说，纷纷上棚揭去红瓦，还拍了照片。当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雨，刚刚诞生的陶瓷厂，几乎被扼杀在摇篮里。如此拆拆盖盖，僵持了一年多。在这期间，由于厂长外行，每窑烧好的成品不及一半，经济压力也日益增加，正值公司濒于破产边缘，厂长忽然不告而别。但这也并未动摇哥哥办好中华艺术陶瓷的决心和信心。

最初的厂房，只有一间四面无壁的窑棚，面积不过八坪

，三间小瓦房，每间不过四坪，一间用来磨釉及放原料，一间用来配釉和喷釉，一间用来绘画，有时绘画的人全到了就坐不下，或搬张小桌到露天画，或挤到别人桌头画，于是他就用可能的财力，在稻田上另盖了约四十坪的竹房，房顶、墙壁全是竹子，夏日酷暑难当，冬日寒风刺骨，全体员工正是在这样的竹棚下几易寒暑，为后日的中华陶瓷草创了基础。

1961年9月11日，波蜜拉飓风横扫台湾北部，刚刚安定的小工厂，一夜之间被摧毁，烟囱倒了，房子塌了，一片凄凉惨景。他经过一昼夜的考虑，认为如果就这样不干，使几年的心血付诸东流，实于心不甘。又认为秀朗的厂子面积小、交通不便；便决定到铁路、公路交通便利的北投重新建厂。于是就在莺歌租到一个破烂的小工厂，把飓风过后仅剩下的几个模子搬了去。这里的条件更加艰苦，窑是用土坯砌的，厨房的饭桌就是修坯台，厨房内灰尘很大，每顿饭菜都要吃下不少土。他除了和十几名员工日夜工作外，还要计划在北投设厂的事。自从在秀朗建厂，虽经过三年半的苦苦经营，但毫无基础，每年赔累，又经飓风扫荡，竟弄得一无所有，欠了一身的债。要在北投建厂，只好重新白手起家。

几经周折，新建厂地才有了着落，但仅地价就要新台币32万余元，要筹措这笔巨款谈何容易。几经奔波，得到一位姓林的老者慷慨相助，才解了燃眉之急。但建厂房、购设备及原料等又各需一百万元，经过多方运筹，才在中华信托开发公司和生产力中心以贷款形式获得解决。但这两笔钱来得快，花得也快。到1963年夏天，不仅欠了员工两个月的薪金，而且两笔各一百万元的贷款已经一年期满，必须先后开始分期偿还；更严重的是公司生产不能正常。他在生产

和财政双重压力下，真是身心交瘁，唯有日夜思考早日摆脱困境的办法。

到北投建厂四个月，又遭到欧伯飓风的洗劫。那是1962年8月5日，狂风暴雨掀去了新建厂房的屋顶，门后的两个锁扣打中哥哥的头盖，使他晕过去半日没有知觉。当时屋内积水20公分深，所有的石膏模都泡在水里，真可谓又一次前功尽弃。但他毫不气馁，再接再厉，很快又复原开工。

谁料1963年9月8日，更加强烈的葛乐里飓风袭击台北。这次不仅风强，而且在暴雨中水库又放水，平地水深两丈多，惊涛骇浪，一望无际。当时厂内员工已疏散，哥哥因需搬运画好但尚未烧的花瓶，滞留在厂，被洪水围困。他只穿着一条短裤冒着暴风雨，游泳到窑房边，从窗口爬入阁楼，但不到半个小时，二楼又被淹没，他只得爬上房顶，忽然一阵暴风又掀去了屋顶，他机智的爬到烟囱的铁梯上，冒着暴风雨，忍着一昼夜粒米未进的饥饿，一直站了三四个小时。到天亮，洪水渐渐退去，环顾厂内，什么都完了，做了半年的存货都漂到半里路以外，所有的设备、原料、半成品都泡了汤，真是损失惨重啊。

但是哥哥仍没有退却，他以惊人的毅力，指导员工清除了两千坪面积二尺多深的淤泥，移走了一个从士林纸厂漂来的体积有几百坪大的稻草堆，还有一只漂进厂内的鱼船，成为受灾工厂中 fastest 复工的一个。灾后，从台湾银行和中华开发公司各贷了30万元，修窑发薪，一切又都从头开始。这样经过了八个年头的艰苦奋斗，中华陶瓷才奠定稳定的基础，前途渐入佳境。

钻研技术

锲而不舍

哥哥本是学经济学的，对于陶瓷一点都不懂。创业初期聘的“自称内行”的王厂长，除了一张不知从那里弄来的秘而不宣的“釉方”外什么也不懂。每窑烧好的成品不及一半。一次，有个高级机关订了四个方瓶，他就烧了三个月。开张几个月连鬼都不上门，这样，怎能不赔本。这时，哥哥深深感到发展陶瓷应首重技术。所以，他自己开始看书作初步的了解，还特别给厂长请了一位专家作顾问，还给他买了中、英、日文有关陶瓷的书，希望能把他培植起来。谁知他什么文都不认识，而且还很固执，总认为他那张釉方，与众不同，是万灵丹，顾问和厂长各怀鬼胎，厂长拿着烧毁的产品请教顾问，顾问总是回答说：“慢慢揣摩呗。”真令人感到高深莫测。王厂长把他那个烂釉方当作宝贝一样不给人看。他配釉时，如果有人走近，就把釉方收起来。就在这技术贫困，人谋不臧，企业濒于破产之际，厂长突然不告而别，什么也没有留下。

厂长一走，马上就有工人去家里请哥哥到厂里配釉。哥哥虽看过一些配釉方面的书，但没经过实验。他就立即去拜访曾任过江西陶业学校的汤校长，邀请他参加中华艺术陶瓷公司。汤先生当即满口答应，第二天却变了卦。他说：“烧窑就是烧钞票，没有那个人发财成功的。”他虽然不参加公司了，却鼓励哥哥继续干，并给了一张白釉方。这时哥哥深切感到，要挽救中华艺术陶瓷公司并使之发展壮大，必须把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于是他借了一本《陶瓷学》和一本绝了版的日译《中国陶瓷学》，又买了一本《日文窑业》手册

以及其它有关刊物，读了三个通宵，对陶瓷的配土配釉有了大略的概念，这三本书也就成了他的启蒙老师。

由于厂里急等着哥哥去配釉，所以他便吃饭、走路、做梦想的都是釉方，一有所得，就立即写在手背上。待到厂里配釉时，每种原料成分的多少，完全依靠自己的判断力。一个礼拜后，产品出来了，完全成功。焦急的哥哥才有所稳定。

一个配方的诞生，往往经过许多次试验。而试验，就需先了解原料的特性及其化学成份。哥哥每天都作试验，他的腰带上挂了很多小卡片，这就是他研究的配方。但在个别紧急情况下，也会全照他的判断配下大批的原料来使用，竟每次都获得成功。所以他常说：“做艺术陶瓷需要相当的勇气，更需要相当的智慧。”

陶瓷工艺上有很多问题，在书本上往往找不到答案，需依靠自己判断。比如陶瓷的土坯上往往会有些气孔或破洞，如果随便拿块泥巴补，烧成后被补的地方颜色深一点，对产品的品质影响很大。哥哥请教了很多从事陶瓷业的人，都找不出答案。于是他开动脑筋，想出了采用医学外科补皮的原理来补，那就是割自己的肉补自己的皮，决不是随便拿块泥巴来补，结果烧出来丝毫看不出补的痕迹。再比如烧窑，每隔天开一次窑，总是坏的多，成的少，重要的原因是烧窑技术不过关。于是哥哥就对窑的构造、性能，火的走式以及操作技术多次实地观察，进行深入研究。并亲自领着工人烧了一窑。平时工人烧窑都是分小火、中火、大火三班，每班八小时。这次则由起火到烧成，24小时一口气拼到底。停火后的24小时冷却，他也没有丝毫睡意。奇怪的是：一般烧窑的状况，窑口的产品总是烧不好；而这一窑从窑口到里

面，一件都没坏。这更大大增强了他的创业信心。

哥哥经营的事业，从性质上讲，是属于文化艺术；在实质上讲，仍属于工业，而且是手工业，必须要靠稳定而精密的技术。在陶瓷工业中，配土配釉是制瓷技术中最重要的一环，为了奠定中华陶瓷的技术基础，求得全部釉方，在葛乐里水灾后，他就下定决心，两年内不分日夜和春夏秋冬，除了大小便，都在工作房，每天试验五个釉方，失败了再试。就这样，整整两年没有上床睡过觉，每当夜深人静，他疲倦的不能支持时，就在试验台上闭着眼睛休息十五分钟或者半个小时，醒来继续再做试验。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六百七十多个昼夜的艰苦努力，终于使中华陶瓷的釉种，不仅打破了中国陶瓷史上的纪录，而且品质上也决不逊于古瓷。

陶瓷的主要技术是配釉和配土。中华艺术陶瓷公司开始烧的花瓶又黑又重。哥哥经过深入观察，发现是配土方剂不当。于是他在研究釉的同时，也在坯土的改良上下功夫。他读了很多中、外有关陶瓷的书籍，但都因与当地原料环境不同而不适用。因此，感到配土比配釉更困难，尤其是做艺术陶瓷的大件，如果没有好的瓷土和好的配方，就不可能烧出好的产品。因为大件艺术瓷体积大，不易成型，烧制中又容易变形，所以做艺术瓷，需要一等一的技术和原料。特别是买来的原料，一次和一次的成份不同，所以他的配方就很难捉摸。一次发生坯在模子里一直不干，大件的東西都塌下来。就请教一位芬兰陶瓷专家，说需减少碱的用量，结果效果更差。但哥哥把碱渐渐增加到一倍的用量才获得成功。在北投开工之初，两个礼拜未生产，原因是坯在模子里就裂了，不能成型。林厂长急得满头大汗，每天做试验都毫无成效，因为他的配土

方式用的是国际标准。哥哥很尊重林厂长，两个礼拜都未表示意见，直到第14天，他用手摸了摸泥浆，才对一位工人说：

“抓把碱用开水化开倒在泥浆里搅一搅再试试。”结果一举成功。从此事中，他悟出一个道理：理论公式必须因地因事制宜。

毛坯成型的问题解决了，面临质量一个更大的难题，就是因为土质不佳，烧不出又白又细的瓷器。哥哥翻了很多书，请教了很多人的，就是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有一次他在烧窑加完炭后，靠墙坐在小橙子上养神，突然灵机一动，想起女人化妆的情景：脸皮黑要先打个粉底。于是如何打粉底，就成为他苦苦钻研的课题。他再去翻书，倒是有“化妆土”的记载，即以一层白土泥浆涂在不白的土坯上。但经过实验，却并不实用。因为两种不同的土浆，它们的收缩率不同，烧制时绝对不能混用。经过多次实验、失败、再试验，后来采用化妆釉而不用化妆粉，完全用女人化妆的原理，先打个粉底，然后彩绘，才使这一技术有了突破。

陶瓷的素坯化妆技术，是哥哥在陶瓷业上的一大改革。但在初使用时，彩绘师画起来不习惯。因为原是画在光溜溜的土坯上，吸水性不那么快；忽改为坯面上加了层白粉，吸水性又快，画的时候，落笔及提笔都要快，否则画笔就被粘住，或是画出的颜色深浅不一。所以，画师们都说不能画。面对这一难题，哥哥在几个晚上下班后，一个人在工厂作试验性的乱涂乱画，并无什么困难。从而，他认为这纯粹是习惯不习惯的问题。于是，他就要求画师坚持画下去。两三个月后，就再没人说不能画了。

经过整整八年的刻苦钻研，攻破了一个个技术难关，终于使中华陶瓷的技术立于不败之地，产品成数高达95%，

破了一般烧窑的记录。

管理制度 成功关键

随着中华艺术陶瓷知名度的日益提高，业务急剧上升，人事日与俱增，由此而引发的会计问题、管理问题、人事问题、外销出口问题、仓库管理问题、贸易文书处理问题、办理劳保问题、员工住宿吃饭问题、生产管理问题、接受订货问题、员工技术培训问题等等，真比研究技术问题更头疼。这时他深深感到，建立一套严格而又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将是事业成败的关键。

哥哥在建立管理制度上的基本观念与建立的基础，是员工与公司、以及公司的负责人，都站在平等互惠的立场上来共同促进事业的发展。他认为：员工寻找工作单位，需要出资人组织公司给予工作机会；老板需要员工贡献智慧和劳力，这是基于双方生活上需要的社会组织单位。所以双方都要站在平等互惠的立场上，共同订立规章，共同遵守，来发展共同事业，不是谁管谁，而是要服从领导。所以他要建立一个理想的管理制度，它的管理基础是平等互惠，管理方式是民主自治，以议会代替劳资互相斗争的工会。在内容上有生产管理、人事管理、设计管理、行政管理；细节方面规定同仁的工作以及衣食住宿、教育娱乐和卫生保健。这本制度，就是《中华艺术关系机构管理规章》，也就是公司的“宪法”。经全体员工会议通过后，上至董事长，下至全体员工都得遵守。并组织规章执行委员会，公司有任何事，都须经过会议，会议所决议的事件，当时同仁有申请复议权及再复

议权，董事长不参加会议，但对决议案得行使同意权或批交复议、再复议权，以及解散议会权。这种管理组织型態实施十余年，成就非凡，从未发生任何纠纷。

中华陶瓷能够在陶瓷业中站得起来，百分之百是靠管理。哥哥考虑的管理方式与基础，是将中华陶瓷的管理筹建在一个民主自治的制度上，由同仁组织“规章执行委员会”，担负起执行规章的管理任务。让同仁自己管理自己。在公司除各人的职权、薪资及职责外，不分员和工，在管理规章前、生活享受及人格尊严都一律平等。

哥哥的管理理论，是先将员工的经济生活建立在一个安全满足，使之无后顾之忧的基础上，然后再加强管理。为此，公司免费开办进修班，加强员工之专业知识与艺术修养；设立各种社团活动，倡导正当娱乐，如合唱团、舞蹈社、定期旅行、各种晚会等。美化工作环境，注意环境及个人卫生，定期作健康检查，设立医疗所，免费为员工看病。设立理发社，免费为员工理发洗头，注意员工之仪容与精神生活，定期强制理发洗头，并不准留长发，禁烟禁赌及标会借款。所以在中华管理规章下陶冶出来的员工，大都具有高度气质与修养，思想纯正，品性优良。

根据哥哥管理中华陶瓷的经验，拟定规章难，执行规章更难。随着中华陶瓷业务的急剧上升，人员也快速增加，一度达到八百余人。由于每个人的教育、家庭背景和个人生活习惯的不同，形成规章执行上最令人困扰的问题。在执行规章制度上，他采取管教并重的方法。比如：一天晚上，有一些太保不良少年和军政高级官员的子弟，带了武士刀、飞轮和小刀，准备次晨拼斗。很多人劝哥哥开除他们。但哥哥坚

持管教并重的方针，把他们留下来用半军事化的方法进行管教，白天做事，晚上上课，加强其生活教育和学术教育，终于逐渐把洪水导入沟渠。其次是教育员工如何运用民主自治的方式，来管理公司的事情和自己的生活，使好的更好，原来不好的也逐渐变好。

为了制定好的规章制度，哥哥在百般繁忙中，还看了很多有关现代管理及法律方面的书，也冷静地观察了很多工商企业及政府单位的管理规章，所以他制定的规章，章节具体，条文简明。怎样做就怎样做，没有任何伸缩性，这样易于执行，既可避免有争执，又可免除执行人在执行上意见的偏差而笔下超生。

在管理方面，哥哥除了管教员工如何做人做事外，还时时刻刻警惕自己，管理自己。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己不正不能正人”、“无欲则刚”，都说明企业的领导人能否管理自己，与事业的成败有重大关系。因此他特别注意严于律己，为人表率，创办中华陶瓷二十多年间，他从来未进过酒家、舞厅或歌厅，从未吸过烟、打过牌、看过电影。总是每早八点半出发上班，中午在公司与同仁共餐，穿的是同样的制服，晚上七时一定回到家，从不出去应酬，早晚收看电视教学，深夜写作到两点，二十多年间，他从未休过礼拜天，也从未在任何节假日休息过。

哥哥在管理上不仅讲究组织，更讲究牵制，单位与单位之间，成员与成员之间，不仅注意互相牵制，而且注意互相监督。在他所领导的每个事业单位内，凡为同仁服务的各单位主管和服务人员，尽管在规章上赋予他们绝对的职权，但哥哥还是随时都严予监督他们有无滥用职权或敷衍塞责的

现象发生。

哥哥在管理上发挥高度效果的是他所创制的规章执行委员会，这是一个民主的企业管理执行单位。将企业全部的管理事务，交给这个委员会执行，它是中华艺术关系机构执法的独立单位。规执会的委员，都是民选，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等高级负责人均无资格参加。开会时，完全让民选的委员自由发言，但不能超出议事范围。开会实况都有录音，对屡次发言不合理或不正确的委员，或是提案都非常有见解的，由全体委员及单位代表大会根据每次开会实况录音评定，劣者给予再教育，优者给予鼓励。会后的会议纪录报呈董事长签署执行。董事长对决议案认为不妥时，有批交复议权。同仁对决议不满时，有申请复议权。由于规委会的组织纪律非常严明公正，所以处理同仁的案子，都是心服口服。哥哥常在同仁间作民意调查，对委员们处事不满者，平均仅有 0.5%。而这，正是中华陶瓷壮大的主要因素。

（任惠珍 女，现年 53 岁，修武县大位村人，现任修武县城关供销社主任，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委员、修武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修武县台胞台属联谊会副主任等职。）

拳拳赤子桑梓情

——张鸿春教授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事迹

张 福 麻

发奋攻读 学业有成

胞叔父张鸿春，字煦万，1919年8月出生于修武县张延陵村。先祖父讳瑶，以耕读传家。见叔父幼年聪慧好学，即言传身教，以期有所成就。

叔父先在本村修武县立第五小学就读，又入武陟省立十四初中及开封省立高中读书。1944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大学经济系，以成绩优异，为当局选任为国民政府财政部关政科长、专门委员等职。

但叔父并不满足于原有的学识，决心进一步深造。于是他到台湾后，不远万里，赴美留学，在美利坚大学管理研究所刻苦攻读，终于学业有成。成为台湾省的经济学家与会计学家。